

石頭記

〔清〕

曹

雪

芹

著

蘇聯列寧格勒藏鈔本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編定

石



記

第一冊

中華書局

石頭記

(全六冊)

〔清〕曹雪芹撰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編定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水利電力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frac{1}{32}$ 11.1%印張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冊

統一書號: 10018.580 定價: (精) 50.00元
(平) 34.00元

序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所藏《石頭記》清代鈔本，經蘇聯漢學家П·Н·緬希科夫和Б·П·里弗京氏撰文研究和介紹^{〔一〕}，近十餘年來，頗為國內外紅學界人士所重視。一九八〇年夏，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主辦國際《紅樓夢》研討會，香港潘重規教授曾發表長篇論文報告他的研究結果^{〔二〕}。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馮其庸、周汝昌、李侃等三位同志應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副所長宋采夫同志的邀請，訪問了蘇聯，任務就是到列寧格勒考察這個鈔本。由於他們在列寧格勒只停留了三天，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詳細閱讀這個本子。現在這個鈔本即將影印出版了，但在付印之前，也還來不及作認真細緻的閱讀，更談不上研究，因此，只好對此書做一些初步的極為粗略的介紹。

此《石頭記》鈔本共三十五冊，線裝，有包角。鈔本用的紙張是清代常見的竹紙，紙色淺米

黃，紙質似不够薄淨光潔，比起「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乾隆鈔本的紙質和黃脆程度來，似都顯得「新」一點，紙質也較粗糙。

這個鈔本的底本是屬於脂硯齋評本，這是無可懷疑的。一是這個鈔本的正文，用脂評系統的「庚辰本」「甲戌本」等，可以大致檢核出來^(三)；二是這個鈔本上的某些殘缺處，也可以從「庚辰本」上查到根據，如鈔本第二十二回末尾只到探春的燈謎：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聽菱歌聽佛經

莫道此生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爲止，以下殘缺。查「庚辰本」這一回正文，與此鈔本殘缺的情況完全一樣。三是鈔本上還保留着脂硯齋的批語數十條，這些批語大多還可以從「庚辰本」「甲戌本」等脂評本上找出來。由此可見，這個鈔本確是出於脂本系統是無可懷疑的。

這個鈔本上的批語，包括眉批、正文下雙行小字批、正文旁夾批、大約共有二百餘條，眉批和夾批應是後人的批語，正文下的雙行小字批，則當是脂批舊文爲多，現舉七十九回（包括八十回）數例如下：

虧得這樣情性，可謂奇之至極。（正文，下同）

別書中形容妬婦，必曰黃髮顰容，豈不可笑（批語，下同）。

只因十事八事，都不遂心。

草蛇灰線，後文方後不見突然。

按：第二個「後」字是衍文。

說着滿屋裏人都笑了。

王一貼又與張道士遙遙一對，時犯不犯。

按：「時」應作「特」。

王一貼心有所動。

四字好。萬端生於心，心邪則意在於財。

按：末句似應作「心邪則意邪」，「庚辰本」作：「心邪則意射則在於邪」。亦誤。

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

奇文奇罵，爲迎春一哭，又爲榮府一哭，恨薛蟠何等剛霸，偏不能以此語及金

桂，使人忿忿。此書中全是不平，又全是意外之料。

以上所舉各例，都見於「庚辰本」同回，文字小有歧異，可以互校。即此，不僅可證批語確係脂批，亦且可證正文實爲脂本文字。

此鈔本鈔定年代，據十七、十八回已分開，十九回已有回目，十九回「庚辰本」於

因想，這裏素日有個小書房，名□□□□□內曾掛着一軸美人，……

這段文字內，有五個字的空白。現此鈔本尚殘留二個字的空白。又「庚辰本」於此下一行「日這般熱鬧，想那裏自然」以下，有二十字的空白，此鈔本已完全鈔滿，不留空白。據此，則可知此鈔本所據底本，似當晚於「庚辰本」，而其鈔定之時間，據紙色紙質均不及「甲戌」「己卯」「庚辰」各本爲舊，則最早似不能早於乾隆末年（乾隆五十年到六十年，公元一七八五——一七九四年），最晚不能晚於道光初年（道光元年到道光十年，公元一八二一——一八三〇年），或當在嘉慶年間最爲可能（公元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年）。

此鈔本另一重要特點，是六十四、六十七兩回不缺和七十九、八十兩回未分開。按國內各本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有的還保留着殘缺，如「己卯本」「庚辰本」〔₂₀〕。有的則已補齊，如「戚本」「王府本」等等。經初步考查，此鈔本的六十四、六十七回，或亦出於「戚本」系統。至於七十九、八十回兩回未分開這一情況，爲各本所無，至今還是《石頭記》鈔本中僅見之現象。大家知道，曹雪芹當年創作《石頭記》，並不是按回目逐回撰寫的，而是下筆一氣寫出好多文字，然後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因此這未分章回，未纂目錄的本子，自然絕大可能是早期的本子（指其所據底本而言）。檢之「庚辰本」，這兩回已經分開，只是八十回尚無回目，則可見「庚辰本」這兩回又似乎當晚於此鈔本。由此可以想象，此鈔本底本的若干部份，應是早於「庚辰本」（這部份所佔比重

不大，現在還只能確指七十九、八十回），而其餘部份，則當晚於「庚辰本」。也即是說，此本在鈔寫之時，所借底本，有可能不是一個來源，而是借用幾種鈔本合成的，否則就難以解釋以上這種矛盾現象。

此鈔本所用襯紙，是清高宗的《御製詩》第四第五兩集。按《御製詩》第四集刻成於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第五集刻成於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則此襯紙，當係重裝時襯入，其重裝時間，必在嘉末道初。總之，當在其鈔畢裝成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再行重裝，則其時必已晚於乾隆六十年甚久，否則，庶民鈔書裝書，豈敢犯封建皇帝之「天威」！

此本重裝之證據，一為檢視鈔本，尚可見殘留裝訂線之洞眼；一為第二十六回末，有一行批語：

此下在十篇之後，誤訂，今挪正。

此外，尚有第六十五回被分裝在第二十九冊，第三十冊，第三十一冊這三冊內，以上三種情況，皆足證明此書確經重裝，無可疑議者〔五〕。

此鈔本所據底本既係脂本舊文，且其中部份還保存早期未分回之初狀，鈔本正文雖頗有脫漏，然亦甚多可以與其他脂本對校，足以補其他脂本之鈔誤鈔漏者，固已彌足珍貴矣。

《石頭記》鈔本，自二十年代始，即續有發現，至今屈指已得十一種矣（靖藏本得而復失，故

未計入)。此本於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傳入俄京，迄今已越一百五十二年，乃賦歸來，實爲紅學界之盛事，亦中蘇文化交流之佳話也！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八日

〔一〕 緬希科夫，其漢文名字爲「孟列夫」，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高級研究員，語文學博士，敦煌學研究專家，著有《敦煌寫經目錄》二卷，紅學論文有《長篇小說〈紅樓夢〉的無名氏抄本》。里弗京，其漢文名字爲「李福清」。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語文學博士，李福清氏爲中國俗文學及小說戲曲研究專家，紅學論文有與孟列夫合寫的《長篇小說〈紅樓夢〉的前所未聞的抄本》。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爲李氏所發現。緬希科夫和里弗京合撰之《長篇小說〈紅樓夢〉的前所未聞的抄本》發表於一九六四年莫斯科出版之《亞非人民》雜誌第五期。譯文載《紅學世界》，胡文彬、周雷編，一九八四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二〕 潘重規：《列寧格勒藏抄本〈紅樓夢〉考索》，載周策縱編《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一九八三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三〕 此本有若干回同「庚辰本」，但第二十八回「庚辰本」中間斷缺，此本不缺，檢「甲戌本」，與此鈔本同。

〔四〕 「己卯本」上現有六十四、六十七回是後人鈔補的。「庚辰本」上此兩回仍缺，現在影印本上是借別本補的。

〔五〕 按以上各處原本頁碼錯亂，此次影印均已糾正。

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的發現及其意義

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

В·李福清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Л·孟列夫

曹雪芹的《紅樓夢》在綿綿二百年裏，一直廣爲流傳，對這部作品的研究已成爲一門專門的學問，其評論著述浩如烟海。在中國文學史上這種現象是絕無僅有的。曹雪芹的這幅卓越的現實主義的畫卷，早爲俄國漢學家所重視，這就不足爲怪了。遠在十九世紀初葉，這部作品就引起了他們的關注。

《紅樓夢》抄本傳入俄國的情況

一八二〇年俄國第十屆傳教團啓程前往北京，隨團前來的Е·Ф·季姆科夫斯基，係亞洲司官員，他受命在華購置書籍，供彼得堡公共圖書館和亞洲司圖書館，以及擬議中的「伊爾庫茨

克亞洲語言學院「收藏」。在所購的書中有兩部《紅樓夢》，一部是四函，價格昂貴，用了八兩白銀⁽¹⁾，爲亞洲司圖書館所用，另一部也是四函，比較便宜，只用了一兩五錢銀子⁽²⁾，送到伊爾庫茨克。這兩部書在「一八二二年在北京所購漢文、滿文書籍一覽表」中均有記載。其中第一部稱爲「描寫一個滿清豪門家族興衰的諷刺小說」，第二部則稱爲「愛情故事」⁽³⁾。

一八二二年，俄國傳教團抵達北京，團長名叫 П. И. 卡緬斯基，係俄國科學院通訊院士，早在一七九四年至一八〇七年間曾來過中國，他精通中文，收集過許多漢、滿文書籍。Е. Ф. 季姆科夫斯基不懂中文，於是就向這位專家求教。估計，購買《紅樓夢》一書，可能是卡緬斯基所薦。在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圖書館收藏的《紅樓夢》老版本中，還有萃文書屋本，上面有卡緬斯基用十八世紀舊式筆法書寫的題詞：「道德批判小說，宮廷印刷館出的⁽⁴⁾」，書名《紅樓夢》。卡緬斯基在書中所作的眉批（主要是一些詞的俄譯）表明，他認真讀過這本書。書中還有其他人的一些批注，說明卡緬斯基給俄國其他傳教士讀過。估計，保存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的列寧格勒分所的《紅樓夢散套》，也屬卡緬斯基所收藏。書上有卡緬斯基的親筆題詞：「中國小說《紅樓夢》之歌曲——用中國音調譜成」。可以斷定，卡緬斯基得到的版本，以及季姆科夫斯基遵照他的建議所獲得的版本是俄國最早的《紅樓夢》版本，爲俄國圖書館《紅樓夢》一書的收藏奠定了基礎。

一八三〇年第十一屆俄國傳教團由彼得堡出發，前往北京。傳教團團員也對中國書籍頗有興趣，希望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書。

這一屆俄國傳教團裏有四名學生，其中兩名對《紅樓夢》很有興趣，他們是А·И·科萬科和П·庫爾梁德采夫。

А·И·科萬科（生於一八〇八年）是一名礦業工程師，他訪華的目的是研究中國的地質，進行「地磁觀測」。爲了從事這項工作，首先必須掌握漢語。他在後來寫道：「需要盡快學會口語，但又無法經常同中國人接觸，爲了學習漢語，我開始讀《紅樓夢》，這本書是用地道的口語寫成，因此正合我意」^{〔註〕}。А·И·科萬科的選擇最正確不過了。《紅樓夢》的語言的確優美生動。

А·И·科萬科還認爲這部作品淋漓盡致地描寫了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稱得起是一部中國人生活的百科全書。他在給礦業工程師總部主任的報告中寫道：「我關心主要的課題（指礦業、農業和手工業——引者），但對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也頗感興趣，爲了更多了解這方面情況，我讀了長篇小說《紅樓夢》。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喜慶節日，婚喪嫁娶，消遣娛樂，官吏宦官的舞弊，奴婢的機詐，中國人（按：應指中國當時的貴族官僚——引者）的貪婪和淫佚，還有母親迎接做了皇帝妃子的女兒的時候的那種排場，——這一切書中都有維妙維肖的描述。迎女兒的儀式實在滑稽。爲了迎女兒回娘家過幾個小時，竟然要築起亭台樓閣，還要引來潺潺流水。總之，奢

華之物，應有盡有。母親要跪下迎接女兒，還要在一間專門屋子裏給女兒叩頭。女兒只有步入母親的內室，才能象一般女孩子見了親生母那樣給母親叩頭。父親要給女兒鞠躬行禮，但不能看女兒一眼，因為他只能在房間的簾外給女兒鞠躬。

「如果把這本書譯成俄文，那麼，那些想了解中國人習俗或希望學習漢語的人將受益非淺〔六〕。」可惜，他的建議沒有得到任何反響。盡管如此，А·И·科萬科仍盡其所能向俄國讀者介紹了小說的某些篇章。一八三六年，他從中國回國後，以德明爲中文筆名，以「中國之行」爲總題，連續寫了十篇隨筆，刊登在一八四一——一八四三年間俄國一家主要雜誌「祖國紀事」上。文章得到了В·Г·別林斯基的贊賞〔七〕。第十篇隨筆是介紹中國教育和科舉情況的，科萬科把他自譯的《紅樓夢》第一章頭半部份附在了第九篇隨筆之後〔八〕。

在一八三〇年末來北京的第十一屆俄國傳教團裏，對《紅樓夢》感興趣的非止一個科萬科，他同來的伙伴中有個叫П·庫爾梁德采夫的學生也從中國帶回一本八十回的《紅樓夢》抄本，這本罕見的抄本目前收藏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九〕。

蘇中兩國學者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合作影印的正是這部難得的抄本。

俄國和蘇聯漢學家對《紅樓夢》的

興趣和研究

據我們統計，在蘇聯圖書館中，保存了六十多種刻本《紅樓夢》及其續集和以《紅樓夢》為題材的作品的老版本，有十個本子是萃文書屋的稀有本子，其中有一部份與一粟等人在《紅樓夢書錄》裏介紹的不全一致。有的本子上還有眉批和夾批，由於篇幅有限，這裏不一敘述。由此可見，蘇聯藏的《紅樓夢》的各種木刻本，大大超過了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各國的收藏。

中國文學傑作《紅樓夢》一直是後來傳教團和外交使團裏的俄國漢學家閱讀的對象。一八四〇年曾隨第十二屆俄國傳教團來到中國十年的B·П·瓦西里耶夫（一八一八—一九〇〇）後來在《論聖彼得堡大學的東方藏書 一文中寫道：「《金瓶梅》通常被譽為（中國）小說的代表作，其實《紅樓夢》更高一籌，這本書語言生動活潑，情節引人入勝。坦率地說，在歐洲很難找到一本書能與之媲美。據說，這部小說是在一個王府裏寫成的，小說出版之前，其抄本售價十分可觀。」^[1]這位著名的俄國漢學家贊揚這部作品語言優美，稱它是中國小說之最。在一八八〇年出的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概論》，他也介紹了《紅樓夢》，並同樣贊揚這部佳作。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一九一九年，當蘇聯還遭受着饑荒和破壞的艱苦日子裏，彼得格勒城出版了《世界文學出版社書目：東方文學部份》一書，書中一一列舉了值得譯成俄文的優秀作品，其中有《三國志演義》和《紅樓夢》、《聊齋志異》、《西廂記》等。

《紅樓夢》的俄文譯本是一九五八年才問世的，由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共兩集，譯者是B·A·帕納休克，他在翻譯中國古典小說方面有相當的經驗，《紅樓夢》裏大量的詩文則是由Л·Н·孟列夫譯成俄文的。《紅樓夢》的俄文譯本，是此書的歐洲語言本中第一個最完整的譯本。著名的中國文學專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Н·Т·費德林爲該書寫了敘言。他闡述了《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名著中的地位，介紹了曹雪芹的生平。他說，雖然《紅樓夢》貫穿着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但是作爲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作者始終忠於生活真實，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塑造了主要人物形象。

從六十年代起，《紅樓夢》可以說是許多蘇聯漢學家研究的對象。爲紀念曹雪芹逝世二〇〇週年，《外國文學》雜誌一九六四年刊登了著名中國文學研究家Л·З·艾德林的文章，題爲《偉大的現實主義者曹雪芹》（一）。艾德林的論述很深刻，他認爲「沒有一部文學作品和歷史著作，能象《紅樓夢》那樣鮮明地揭示行將滅亡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全部特點和流弊。」作者得出結論說：「曹雪芹的書告訴我們，即使一對互相愛戀的青年男女得以結合，也未必能得到幸福。在

這個生育他們的腐朽、自私、貪婪的世界裏，他們是無能爲力的。是孤立無援的。」

同年，李福清與孟列夫寫了題爲《前所未聞的〈紅樓夢〉抄本》一文，這篇文章第一次介紹了П·庫爾梁德采夫帶回的小說手抄本，並對蘇聯圖書館收藏的這部作品的一些舊版本作了簡要的介紹（17）。

不久，O·П·菲什曼在《中國諷刺小說》一書中，對《紅樓夢》進行了評述。作者認爲《紅樓夢》是一本具有啓蒙主義的生活題材的小說，在這裏，對封建制度的批判是同傷感地維護人的感情，維護擺脫了家庭和社會束縛的人的感情結合在一起的（18）。她還說，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些活生生的人，他們具有複雜的心理世界，有各自獨具的特點」，但同時又是具有概括意義的典型。作者指出，「曹雪芹登上了心理描寫的真正高峰。」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O·M·林林開始專門從事《紅樓夢》的研究工作。她於一九七二年完成了候補博士論文《曹雪芹小說〈紅樓夢〉的新主人公》，根據論文的材料，她爲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學習中文的學生編寫了專門教程——《曹雪芹和他的小說〈紅樓夢〉》，一九七二年莫斯科大學出版。O·林林稱小說主人公賈寶玉是一位與尊孔社會的固有觀念相抵觸的嶄新的正面人物。小說有意把寶玉父親和寶玉的性格對立起來，寶玉對內心世界自由的追求經常衝擊着父親的宗法道德觀念。林林認爲「小說女主人公之間的衝突以寶釵勝利、黛玉失敗而

告終。但是寶釵的勝利不啻是失敗，而黛玉的失敗是永恆的勝利」(一四)。

蘇聯研究人員是從許多不同的方面研究《紅樓夢》的。應該特別一提的是漢學家兼畫家 П·斯喬夫介紹《紅樓夢》裏的服飾和人名的象徵意義，這是一部內容新穎的著作。П·斯喬夫一生研究中國服裝史，他認為《紅樓夢》人物的服裝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服飾猶如一幅圖畫，反映一個人的本質和他經歷的世海滄桑。

列寧格勒艾爾米塔什(冬宮)博物館的 Т·Б·阿拉波娃則寫過一篇題為《曹雪芹的《紅樓夢》是研究十八世紀中國盜器使用的依據》(一五)，這篇文章，與上述斯喬夫的著作一樣，是從文物的角度來研究《紅樓夢》的。

蘇聯在收藏和研究《紅樓夢》方面，還有許多值得介紹的情況，限於篇幅，不能盡述。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俄國和蘇聯漢學家在研究曹雪芹這部傑作方面，已進行了一定的工作，目前還面臨着更多的工作，包括蘇聯收藏的這部小說的早期版本的考證和對《紅樓夢》綜合全面的專題研究。我們認為要完成這些任務，需要蘇聯、中國紅學家的合作，這方面的工作，實際上業已開始。蘇、中聯合影印一八三二年 П·庫爾梁德采夫帶到俄國的《石頭記》抄本就是一个例子。